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qlwbm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烟台独有的水车



芝罘挽歌

安家正

水车,是运输饮水的专用车辆,他处皆无,烟台独有。

它是老烟台人应对水资源短缺的措施,直到自来水出现之前,是市民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公共市政服务。

所谓水车,就是一个地排车上横

躺着一个加长的硕大木桶,里面盛着600多斤洁净的水,由送水工人挨门逐户地送去。每天凌晨,不用摇铃,约定俗成,街门洞开。送水工拨开木桶一端下部的木塞,清水汩汩流出,用小管接住(每桶约30斤),然后提着进家。倒在院子或者正屋备好的大缸里。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一口能盛三担水的大缸,用以储水。

送水,当然得花钱买,却绝对是笔糊涂账,然而双方无从争执。只是送水工人每天送了几桶水,然后就在门洞中自取几张水牌,到月底甚至年底一并算账。反正水票很便宜,没人去计较多了少了。

烟台水井多,几乎每条街上都有

口水井。但是,井多甜水少,大多是溲水井。那时井分甜水井和溲水井两种,也许因为近海的缘故吧,大多是溲水,又咸又涩,没法饮用;甜水井极少,只在近郊菜园里有屈指可数的两三口,得凌晨赶了去排队挨号,挑着走几里路,吃水十分金贵。送水的行业应运而生,水车成为他们的主要生产设备。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年烟台的水厂。据《毓璜顶文化》披露,当年在老火车站对面的世昌街上,有个私营水厂,水厂大院内在房子里有两个大水池(约10米长,6米宽),地下进水管连通的水源是烟台南山河沟的泉水,这些水一部分通过下水管流进海港码头西崖的一艘船上储存。烟台港停

靠的打鱼船,小风船都到这个水船买水、上水,另一部分水专供水车买水拉水。

显而易见,这是烟台的水脉,全市的水源所在。这可是要命的垄断企业呀!它若利欲熏心,丧尽天良,也不须举行个什么“价格听证会”,也不用借媒体造什么舆论,只消把水牌来一番暗箱操作,价格上升几个百分点,就足以让市民叫苦连天了。然而,这家私营企业却是行业自律,决不肯借水打劫,烟台市民没有饮水思源,它也无怨无悔。

水车承载着老烟台的“儒商传统”,是烟台商业诚信为本、人文为本道德的载体。

窝子与阁楼



刘文权

建国前,渔家生活烙印,往往从民房的建筑特色体现出来。那时,石墙、土壁、草屋顶,锅台、火炕、小门窗,建筑风格大同小异。令笔者不解的是,大凡旧房老屋,在锅台与火炕之间的土坯壁子之间,都设有一个二尺见方的方洞,上安玻璃,不能启动。靠炕的台面能宽大一些,人们叫它是“窝子”。

说起窝子,主人滔滔不绝,看来是长辈的一大发明。说,家人常年不离火炕,剪子、刀子、针头线脑的,随手放到窝子台上,特别是预防伤了淘气的孩子。再说,岛中火油(柴油)高贵,为了省油,把油灯放到台面,别看一盏枣骨大的小灯,可里外都亮堂。有时,灯芯头大了,冒黑烟,又不亮,还耗油,放在窝子里可随手拨拉拨拉,就是老娘们儿在炕上做营生也得眼。

炕屋的窗多是纸糊的,没有玻璃,院子的情景看不到。偶尔,风门子开了,是风刮的,是鸡鸭猫狗进来了,还是有亲邻客人进家了,可从窝子里一目了然,该打招呼的,主动去呼应。然而,窝子也是瞭望台、观察哨。旧时,在家庭成员中,男主外,女主内,而婆婆是家务的大总管,当家理财的权力至高无上。俗话说,船上老大(船长)第一,家里婆婆第一。尤其在婆媳之间,等级分明。婆婆怎么说,媳妇不能犟嘴,婆婆的话错了也是对的,照办,是孝顺的表现。

在日常生活中,三顿饭往往是媳妇的专利,而婆婆则是坐在炕上指挥。媳妇在外地(堂屋)忙活什么,都在婆

婆的掌控之中,指挥和监督又成了婆婆的专利。对于好的媳妇,凡事多请示,勤汇报,嘴儿要甜,讨婆婆喜欢。比喻做什么饭,煊什么“就食”,锅上锅下的事,婆婆要一概心中有数。就连火烧得多少,几开了,婆婆可通过窝子看看气冒得大不大来决定时辰。烧多了,费草;烧少了,缺火。对饭量,比如几人吃饭,该下多少米,该擀几块面,若有来客或逢节日,炕上的要多参谋,地下的要多示下,窝子是相互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的眼睛。特别是蒸、炒、炸、焖这些关键工序,婆婆要在窝子里有的放矢,指挥得有理有据。

有的人家媳妇不然,有时在锅灶上偷吃,有时怕费事,粗手大脚糊弄人。窝子,是约束媳妇的一道“岗”,因为窝子里常常会出现严厉的目光。即使婆婆躺下了,睡了,可窝子却“睁着眼”,需随时提防。由此可见,在那个不平等的社会里,窝子是婆媳之间人际关系的见证。

风帆时代,渔家子女多,住房窄,家口大的,睡觉是个难题。有的,到亲戚邻居家借宿;有的,大人孩子挤在一铺炕上;有的,一家三代人睡在一起,多有不便。被逼无奈,不少渔户在炕屋的门与山墙之间,安梁铺板,建成半间阁楼,在炕上竖起一个矮梯子,便于半桩孩子上下。这样既可减轻大人孩子的拥挤,又可把不用的行李、破旧衣物、甚至一些不便显眼的物件发到阁楼上,算是家中的“密室”。

渔家的阁楼不仅宽敞,利用了空间,可防潮、防鼠、防盗,而且是家中的安全港。有的户主在当年闹革命时,阁楼还掩藏过地下党。1948年,长山岛特区党员干部在转移东北时,大钦岛东村一家还在阁楼上掩护过北上的区委书记,躲过了国民党第八军在岛内侦察与搜捕。没想到原来给孩子睡觉的地方,成为革命干部的藏身之所。

渔家的阁楼是时代的产物,是海岛渔乡“楼”的雏形。随着旧房的改造和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厢房、平房和楼房的建造,阁楼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淡出人们的视线,成为家庭住宅的一段史话,被陈封在史志的记载之中。

莱阳专区时的中医进修班

赵术经

1958年10月18日,国家批准改莱阳专署为烟台专署,治所迁烟台。莱阳专署完成历史使命。在莱阳专署发生的故事成为历史的见证。

龙口市东江街道毡王村赵佩之的遗物中,有一帧1957年莱阳专区黄县中医进修班结业纪念照,述说那段历史。那个年代,群众生产生活正在恢复期,缺医少药,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为了充分发挥中医作用,让当时具有一定水平的中医通过培训学习,提高医术,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黄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遵照省卫生厅和莱阳专署卫生科的部署,于1956年10月15日开办此次进修班,1957年1月结业。

这次进修班学员有黄县(现龙口市)的马玉祥、王玉山、林乃杨、李伟春、赵佩之、官恩照、慕文达、周子经、刘玉斌、迟水亭、张景源、徐德卿;蓬莱县(现蓬莱市)的王自宽、韩乐新、宋喜满、高华亭、李登福、马德纯、孙坤山、张泽香、葛子政、



孙世德、朱元训;掖县(现莱州市)的孙方甫、毕和生、史晋三、任登荣、孙福山、孙汉相、宋秀才、任学清、彭万年、潘希九、盛安太、张瑞云;招远县(现招远市)的路明善、吕宝玉、张乐星、傅永贤、范云亭、傅里桥、温召南、杨华亭、赵斌佩、陈兆三、李福祥;及宋瓚卿、刘明德、穆志丰共49名。当时黄县卫生科科长林鹤亭任进修班主任。此次进修班应该是莱阳专署卫生科分片在黄县举办的。

这次进修学习内容为中医伤寒、生理解剖等。这批学员经过培训,提高了医术水平,像照片的主人赵佩之(第2排左起第2位)和王玉山、迟水亭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名医,在乡间民众中声望很高。赵佩之和王玉山在1966年黄县第一届中医学徒班中成为师傅。他们继承发扬我国医药学精髓,加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缓解卫生工作者不足的局面,为农村治病防病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爹爹变爸爸的往事



张功基

回眸昔日乡村,我想起了当年“爹爹变爸爸”的一些有趣往事,尽管距今已经十分遥远,但拂去岁月的尘埃,却依然清晰如初——

50年前,蓬莱一带,子女对父亲的称谓有两种:一是爹爹,二是爸爸。叫爹爹的人在每个村子里占绝大多数,而喊爸爸的人在每个村子里则超不过三五户人家。我们那时觉得挺纳闷:同样是父亲,为什么有的人叫爹爹,有的人却喊爸爸呢?我们那时尽管才十来岁,但却非常固执地认为:跟父亲叫爹爹不仅亲切熨帖,而且天经地义;跟父亲叫爸爸响亮归响亮,但我们谁也张不开口,听到个

别小伙伴跟父亲喊爸爸,我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后来,我们问老师、问父母,终于明白了:爹爹是最普遍的传统称呼,而爸爸则是最文明的称呼,城市里的孩子都这么叫。再后来,我们也明白了:每个村子里为数不多跟父亲叫爸爸的孩子,他们不是出生在城市里,就是父亲在城市里工作,至少也是在公社和县城里上班。最重要的是,叫爸爸的那些孩子,他们吃的穿的比我们这些跟父亲叫爹爹的孩子都好,而且那些孩子的爸爸不像我们这些孩子的爹爹那样在村里泥里水里挣工分,而是在城市里干干净净、体体面面上班,吃的是“公家粮”,挣的是“国家钱”。

我们村里的胖墩儿小林,还有对我们这些男孩子总是爱答不理的小华,他俩就有这样的爸爸。其实,我们从小林和小华那儿都得到过一些好处:小林不但借给我们他爸爸买的彩色铅笔画画,还送给我们他爸爸寄来的饼干;别看小华高傲得像个小公主,她也曾给过我们每人一块带漂亮糖纸的糖块儿呢。

就这样,不知不觉间,我们对爸爸这一称呼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由反感到适应,再到羡慕,

就差没改口跟自己的爹爹也叫爸爸了。说到改口,当时我们小伙伴中还真的有几个人尝试过,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村东老柳树下的栓柱,那天傍晚我们随他去家里玩,他一进门就朝坐在小凳子上的爹大声喊爸爸,他爹愣了一下,接着吧嗒着烟袋说道:“小兔崽子,你刚才叫我爸爸是不?快拉倒吧,咱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你有叫爸爸的命吗?我有当爸爸的命吗?你这辈子还是老老实实地叫俺爹爹吧!”听了这话,我们和栓柱站在院子里只能哭笑不得。

然而,也就一两年的工夫,当我们这茬人升入高小读书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仿佛就在一夜之间,爸爸的称呼开始在乡间蔓延流行开来。爹爹这个不知存在了多少年的父亲称谓,便自然而然地从牙牙学语的小孩子口中逐渐消失了。也就是说,爹爹这个称谓的最后终结时间,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而接替爹爹这个称谓的爸爸一词,在乡间推而广之不过半个世纪的时光。换言之,即如今蓬莱一带农家50岁以上的人称父亲为爹爹,而50岁以下的人则一律称父亲为爸爸,这种情形,在胶东乃至整个山东也大致相同。